



黄河路唐墓出土的陶俑。

观察

不止长安洛阳

一座辽西边城的盛唐记忆

本报记者 郭 平 文 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

礼乐坐标

一套黄绿釉鼓吹仪仗俑格外引人注目。

11件陶俑各司其职，骑马击鼓、吹排箫、奏羯鼓，队列整肃。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党委书记、研究馆员李新全介绍，这是唐代高阶官员才可使用的丧葬卤簿仪仗。此前，这类成套鼓吹仪仗俑仅在长安、洛阳两京核心区域集中出土，在辽西极为罕见。

它们的出现，意义远不止于填补考古空白。礼乐制度是中原王朝政治秩序的外化，仪仗的规格、排列、乐器组合皆有严格定制。这套鼓吹仪仗俑在辽西边地完整现身，说明唐代营州（今朝阳市）并非文化孤岛——中原的礼制体系已被完整承袭，礼乐文化已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深根。一座边城，在制度层面与千里之外的长安（今西安市）保持着高度同步。

与之呼应的是彩绘武士俑，通高近百厘米，怒目披甲，衣纹利落。武备与礼乐并置，恰是唐代边疆治理的一体两面：既有文治的秩序，也有武功的威慑。

四方人群

如果说鼓吹仪仗俑呈现的是制度的统一性，那么面貌各异的人物俑，则揭示了营

州社会结构的丰富层次。

孙则墓出土的陶昆仑奴俑前，常有观众驻足良久。这件陶俑卷发蓬松、浓眉高鼻，上身袒露、斜披巾帛，双手握拳恭立。“昆仑”是唐代对南海一带族群的称谓。他们多沿海路进入唐境，在贵族府邸中服役生活。这件昆仑奴俑出现在千里之外的辽西墓葬中，说明南海族群的身影已进入营州的日常生活——唐代的“国际化”，不止于长安西市，也延伸到了东北边地。

更有意思的是两件髡发石俑，一男一女，独立展陈。男髡发石俑脑后垂长髡，右臂架鹰，手持铁挝；女俑脑后编髡垂背，腰间佩香囊与佩刀。李新全回忆，出土时两件石俑通体施彩，脸和手涂粉色，头发饰黑彩。文博专家姜念思考证后指出，这种保留前额头发、向后编髡的发式，属于粟末靺鞨。而他们的服饰——圆领长袍、玉带、尖头长靴——完全是中原规制。女俑双手置于胸前所行之礼，正是唐代流行的叉手礼。

发式存旧、服饰从唐——这是一组极为精微的文化符号。史料记载，内迁的靺鞨部族“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这两件石俑，正是这段历史的物证。一个族群主动接纳另一种服饰、另一种礼仪，其背后的文化认同与选择，比任何文字都更具说服力。

西域的胡商、南海的仆从、东北的靺鞨、中原的汉人——四类风貌迥异的陶塑

遗存同台陈列，不是器物的堆砌，而是一幅真实的族群共居图景。李新全指出，墓中中原风格陶俑、西域风格泥塑、北方民族特征器物共存，反映安史之乱以前，朝阳地区是多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

文明底色

这些陶俑的价值，不在于工艺的精湛，而在于它们承载的文化信息。唐代的强盛，常被描述为疆域的辽阔与国力的雄厚。但真正让一个时代具有穿透力的，是它对不同文化的包容能力。

在营州，中原的礼乐制度被完整复制，西域的商旅往来穿梭，东北的部族主动汉化，南海的族群远道而来。这些彩俑所凝固的，正是一个社会如何处理“我者”与“他者”的关系——不是排斥，不是同化，而是共处。多元族群比邻而居，各安其位，共同构成了这座边城的日常。

相较于史书的简略记载，朝阳唐墓出土的彩陶俑以可视、可感的形态，填补了唐代辽西民族交融的细节空白。它们提醒着后人：大唐盛世的繁荣不仅局限于中原腹地，地处辽西的营州同样以开放的姿态汇聚四方。这些跨越千年的陶塑遗存，是辽宁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见证，更镌刻着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深厚底蕴。

国宝AI了

我是一匹马

本报记者 孙明慧

你们看我姿态如此高贵，应该就能猜到，我绝非什么凡马，而是颇有些传奇色彩在身上的“舞马”。

舞马的技艺由来已久，唐玄宗时期走向鼎盛。我们的职责是为皇帝祝寿，所以，必须得保持优雅。彩纹花绣的锦衣一披，金铃铛一戴，连鬃毛都要用珍珠宝玉装饰。雅，实在是雅！

扫码观看视频



釉陶舞马俑。

延展

一个家族的故事

2003年，朝阳市纤维厂原址基建工地发现了17座唐代墓葬，均为砖筑单室墓，排列紧密有序。其中三座墓各出土墓志一合，墓主人分别为孙忠、孙则、孙道，证明此处为孙氏家族墓地，是辽宁地区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家族墓地。

孙则是这个家族中官职最高的人物。他的墓志顶盖刻着“唐故明威将军左骁卫怀远府折冲都尉上柱国沔阳县开国公孙君墓志铭”，志文楷书阴刻，全文675字。读这份墓志，像是翻开一个人的履历，又像是听一位老者在讲述自己颠沛却清晰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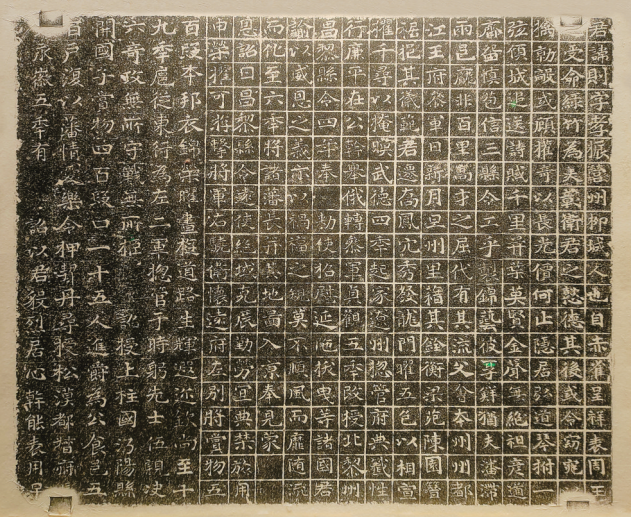
孙则，字孝振，营州柳城人。唐武德四年（621年），他就在安置契丹内属部落的辽州总管府出任典签。后来奉皇帝敕命出使漠北，招慰薛延陀、拔曳固部族，志文记下了他出使的场面：“谕以感恩之义，示以祸福之规。莫不顺风而靡，随流而化。”贞观四年（630年），他带领各蕃部首领，携带部族地图入朝觐见；贞观十九年（645年）追随唐太宗出征辽东，担任左二军总管；之后出任松漠都督府长史，代表朝廷监理契丹靺鞨府州。

同墓地出土的孙忠墓志，则记下了唐军在辽东作战的鲜活场景：“与营州都督程名振共领骁雄……直指虏庭；珥珥长驱，横奔寇室。遂使稻粱漠漠，三韩罢剪获之心。”史书里寥寥几笔的战事，借一方墓志有了更具体的细节——你能读到那支军队直捣敌营的果决，也能想象战后田野上稻粱静默的景象。

独特的“户籍册”

墓志更大的意义在于传递真实的历史信息。省文物保护单位专家组成员、研究馆员田立坤通过对朝阳地区唐代墓葬出土志文深入研究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朝阳地区陆续发现隋唐墓葬200余座，其中有纪年墓志21方。这些埋入地下的石头，以工整的字迹记述了墓主人的生平，也记录下当时营州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民族流动乃至宗教习俗。



孙则墓志拓片。

分析认为，隋唐时期营州出土墓志对应的居民划分为三类：北朝营州遗民、隋唐中原移民、唐初内附蕃人。韩、蔡、孙、杨、骆、高等十余个姓氏的人们，在这里安家、仕宦、生老病死。

翻看这些姓氏，像是在翻阅一本边城的户籍册。氏人后裔杨和，十六国后燕迁居龙城，遂定居于此；骆英、高英淑、杨律，出身契丹部落，却遵从中原丧葬礼俗，镌刻汉字墓志；还有自称“南阳白水”、实为西域羯族后裔的张狼，前来营州担任靺鞨州的属官。考古工作者结合墓葬实物发现，方形、圆形砖室墓被不同族群共同使用，“表明不同人群之间文化的融合与认同”。不管是中原远赴边塞的官吏，还是内附而来的奚、契丹、西域部族，在营州这片土地上共同推动当地的经济文化繁荣。墓志成为这种多民族共生共居生活场景的坚实物证。

事实上，考古证实隋唐以前由于民族大流动、大迁徙，当时社会对外来文化持包容与开放的态度，中亚商人来营州经商、移民没有任何限制，营州成为中亚粟特商人的聚居地

和文化传播地。唐代从营州到朝鲜半岛还存在一条重要的交通路线——“营州入安东道”，营州的地域文化由此传播至东亚。这条路线不仅是一条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也是连接农耕与草原文明的纽带与桥梁。

站在今天的朝阳回望，那些跋涉在古道上的商旅、使者、部族首领，他们的足迹与这些墓志上的名字重叠在一起，勾勒出一幅边城生活的完整图景。

石面上的韵律之美

唐代墓志的阅读有两道门槛。其一，志文用的是繁体楷书，并非今天通行的简体汉字。其二，是如何欣赏唐代碑志的骈文。

骈文也叫四六文，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书面文体，兴盛于南北朝时期。初唐的朝廷诏诰、诏书、碑铭、祭文普遍采用骈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初唐四杰”，都是骈文高手。我国古代墓志出现于汉魏，南北朝时期成熟兴盛。到唐初，这套碑志写作范式被直

接继承下来。骈文辞藻华美、对仗工整、用典渊雅，自带庄重华丽的文体气质。唐人往往重金请专人来书写墓志，期望让先人的事迹得以永久流传。

孙则墓志的序文采用骈散结合的形式：开篇家世用大量四六骈句；履历记事部分转为散行叙事；结尾哀辞回归骈偶；最后的铭辞是标准四言韵辞，完美体现了初唐墓志的典型形态。开篇之后讲家世：“自赤雀呈祥，表周王之受命；绿竹为美，彰卫君之懿德。”这句话说孙则的先祖为周文王和其第九子卫康叔，用了“赤雀呈祥”这个西周受命的祥瑞传说，又用“绿竹为美”这个《诗经》中的典故赞美先祖的美好德行。此后继续用骈文讲述孙氏家族祖辈上英才辈出的往事。随后从祖辈、父辈再讲到自身的经历，体现中原重视家族谱系的传统。记述为官的经历，使用了“制锦”（喻指贤能之士担任县令）、“烹鲜”（《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典故，推崇儒家理政理想；哀悼丧亲，引用“风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陟岵”（《诗经》指思念父亲的典故，弘扬儒家孝道）。

这些典故、修辞和价值理念，随着志文完整传入营州，在唐王朝的东北边城扎根传承。读这些文字，你能感受到骈文的韵律之美在石面上起伏，也能感受到一个时代对礼法、孝道、功名的郑重其事。

临摹千里之外的笔意

营州地处边陲，远离长安、洛阳，但并不缺少谙熟中原文化的本土读书人。从出土的21方纪年墓志来看，大多数没有留下撰文、书丹者的署名。

田立坤通过大量的比对研究，将这批墓志的撰稿人来源主要分为两类：多数是墓主人的直系子孙，也有一部分出自亲友、僚属之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营州存在墓

志写作范本流传。田立坤指出：“撰写墓志铭对于当时的一般士人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而且在民间可能还有范本流传，撰志者可根据逝者的行状及自己的见识学问有所损益。”部分志文甚至直接化用南北朝庾信的碑志旧文，除改换姓氏、郡望之外，句式结构几乎原样承袭。远在辽西边地，中原内地的碑志范文已经在营州士人圈子中传播使用。

志书的书丹书写同样藏着时代信息。对比孙则墓与杨和墓两方仅相隔三年多的墓志，二者虽然同为楷书，但书风差别明显——杨和墓志字形狭长、布局紧密，孙则墓志字形横扁疏朗，说明并非出自同一书手。勾龙与左才墓志、骆英与高英淑墓志，两年代接近，书法面貌却判然有别，可见营州当地拥有多名擅长碑志书写的士人。书法风格也能看到文化流动的痕迹：部分早期墓志还保留北朝魏碑遗意；时代稍晚的王德、韩相墓志已经显现褚遂良楷书的影响；骆英墓志则带有王羲之行书的风韵。边陲营州的书法，持续跟进着中原书风的演变。这让人忍不住去想：在那个没有快递、没有网络的时代，一种书体的流行要翻越多少山岭才能传到辽西？而营州的读书人又是以怎样的耐心，临摹着千里之外的笔意？

唐代的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在地方州县都设有官办的州县学，民间还有私学和家学。营州虽然是“境连边奥，地接戎藩”的边州，也不应例外。通过对隋唐营州纪年墓志撰文和书丹人的考察，可知当时在营州活动着一个包括唐初内附蕃人后代在内的本土士人群体，营州的教育无疑是这个群体得以成长的重要条件。这些读书人或许不曾到过长安，但他们手中的笔，却与那个时代最前沿的文化脉动保持着某种共振。

1300年过去，营州早已改换名称。沉睡地下的一方方墓志，却把那个多民族互动的时代保存了下来。